# 转基因与塔西佗

[ 张锦程 2018012082 ]

公元68年，在叛军的步步进逼中，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第五任皇帝尼禄被迫于逃亡途中自杀，结束了他14年的统治。至此，由屋大维·奥古斯都所开创的罗马帝国第一世袭王朝落幕了。尼禄的继任者，西班牙行省总督加尔巴，却并没有成为一位明君，而是一意孤行，不得人心，无力挽救混乱的局势，最终踏上了前朝的不归路。

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件小事，有两个人，一个是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而被处死，而另一个人是因皇帝的不作为而含冤而死，但对于两人的死，民众都产生了怀疑和负面情绪，甚至于阴谋论的泛滥。塔西佗为此感叹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往事越千年，1900余年后，塔西佗的警言色泽不减，犹在耳畔。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河南兰考县常委扩大会上提醒全党同志警惕“塔西佗陷阱”，此举将这个陌生的拉丁政治学术语拉回公众视野，而这个词本身的含义也在不断扩展。比方说东北经济下行，以致投资商谈东北而色变；“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盛行，温州一度成为假货的代名词，诸如此类，都可以被称为是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政治领域的塔西佗陷阱和今日的转基因困局，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不能相提并论，但其本质是相似的，即公信力的下降一旦到达某种临界点之后，民众的信任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以致谈虎色变。由此观之，将当今中国转基因产品普遍所蒙受的不信任、不理解乃至妖魔化理解成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也未尝不可。

虽说都是塔西佗陷阱，但政治领域和现在转基因领域的塔西佗陷阱内在机制却有不同。相对前者而言，转基因塔西佗陷阱的产生更有一种传播学、社会学上的意义。

美国科学传播研究学者尼斯贝特等透过对30年间转基因技术与美国媒体的考察与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一些国家 ，转基因都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 ，而是成为掺杂了政治 、历史 、国际关系等诸多话题的社会问题 。

转基因由科学问题向社会问题的社会化渐变，是涉及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多种 因素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对转基因的争议、质疑以及不信任，在文化层面是其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天地人为中心的和谐观念的冲突；在技术层面是对改变人类生存环境的技术的不信任；在政治上表现为对政府监管能力认同的缺失。如上这些是转基因塔西佗陷阱的社会起源。【1】

而它们的相似点更在于，无论是转基因还是政治塔西佗陷阱，都是一种群体非理性的反应。而随着当代新媒体的深入发展，大量信息涌入人们的生活，各种谣言和恐慌掺杂其中，对这种群体非理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转基因塔西佗陷阱的传播学起源。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和判断极大的受到媒体信息传播的影响，因为，社会大众对于转基因食品问题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一问题背后包含诸多未知的专业技术细节，此时媒体成为了引导个体认知的重要因素。目前，转基因食品问题的讨论已经逐渐远离科学知识、专业知识及食品安全知识的争论范围。一些人把对政府的信任、社会不安全感、民族主义等社会情绪也夹杂进转基因食品问题的争论中，使之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一场关乎民族大义的立场之争。而这种所谓发散的讨论，更多地是掺杂了非理性的因素，所以到最后更加容易被恐慌或者不信任所胁迫。【2】

塔西佗陷阱的真正可怖之处在于，在平静的表面下，往往有暗流涌动，或是疑虑、或是不满，很长一段时间，它难以察觉，甚至还会催发太平治世般的错觉，而一旦临界点被突破，问题一经暴露，就如同决堤洪水，有着极强的破坏力。

很多时候，这种破坏性地力量绝不会自立藩篱，将影响孤绝于某一领域，以转基因困局为例，除了引发对食品安全及食品安全管理的不信任，转基因食品信任危机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不信任。在社会关系中，社会公众和科学工作者、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社会公众和媒体工作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沟通少也导致了社会关系中的不信任。当公众为自己的利益担忧，难以从正规渠道了解到及时、准确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时，心生不满以至对权威和精英产生普遍性的不信任也就在所难免。[3]

然而，人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昨日，在人口日益膨胀、气候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未来，转基因是人类进步的必经之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画地为牢。所以，转基因塔西佗陷阱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也不能逃避，而是要用科学的认识，直面塔西佗陷阱，用合理的方法，重新构建起民众对于转基因产品的信任。

而我们该如何重建信任呢？

作为民众来说，能做到保持理性，就事论事而不随波逐流当然有利于推动转基因舆论生态稳中向好地转变，最终让转基因不再处于疑虑的风口浪尖。但是没有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工作方式的变革，仅仅依靠民众自立自觉，是不现实的。而在当今转基因困局的具体语境下来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很多，其中重塑食品安全管理公信力是核心的问题，也是根本的手段。从源头的行业规范措施、流通层级的筛选过滤措施到用户端的辟谣和防谣宣传措施，再到配套的法律法规，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领域。

从具体措施出发，首先开诚布公，建立公共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实现公共政策制订和执行中的制度创新，只有公众广泛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订和执行的过程中 ,才能保证公共政策符合公众利益 ,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 信任。政府要公开、透明、诚实守信，并且要切实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信用意识。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新闻界生态首当其冲当今，因为现在，随着网络和社交平台的进一步发展，朋友圈、短视频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即时性改变了信息传播中传统媒体垄断信息资源的局面，但同时也使谣言传播的边际成本进一步下降。除了加强监管之外，我们也要将这股力量往向善向好的方向发展。应充分认识到自媒体也可以是新时代公民参与公共事件处理的工具，积极主动掌握新媒体话语权，正确对待公众通过微博、微信发表的言论，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及时处理以防止民怨积累导致塔西佗陷阱的产生。在社会治理方面媒体，也包括新媒体，并非洪水猛兽，如果政府采取积极的正视态度，那么新媒体也可以大有作为，成为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监督政府部分官员腐败、加强政府政策运作透明度、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重塑政府公信力的工具。[5],[6]

参考资料：

[1] 陈刚. 转基因争议与大众媒介知识生产的焦虑 ——科学家与新闻记者关系的视角[J]. 国际新闻界, 2015, 37(1):101-113.

[2] 余慧, 刘合潇. 媒体信任是否影响我们对转基因食品问题的态度——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的数据[J]. 新闻大学, 2014(6):89-95.

[3] 邓家涛. 转基因食品对人的信任的影响[J]. 科技风, 2017(16):266-266.

[4] 高卫星. 试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与重塑[J]. 中国行政管理, 2005(7).

[5] 杨妍. 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5).

[6] 王雪娇. 对媒介重塑公信力的对策及意义的探究[J]. 文学教育：中, 2013(1):33-34.